

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與實踐的困境

● 成 慶



李福鐘、薛化元、孫善豪、陳儀深、潘光哲編選：《自由中國選集》，全七集（台灣：稻鄉出版社，2004）。

對於漢語學術思想界而言，檢討中國近代以來自由民主思潮在政治實踐中的得失一直是熱門的話題。在台灣，雖然民主轉型初步完成，但是很多知識份子對於當下台灣的民主品質尚有深深的憂慮；而在大陸，市場經濟的推行並沒如預期那樣有效地推動民主的進展，反而有形成官僚資本主義的趨勢，公

平問題日益突出，政府的威權性格也越發明顯。兩地的經驗路徑不大一樣，因此對民主實踐的經驗總結自然也有很大差別。假如考慮到大陸1949年之後自由主義傳統的中斷，台灣自由主義思潮的脈絡似乎更為明晰，也更容易看出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在自由民主理論與實踐中的困境所在。

無論如何，要考察台灣自由民主思潮的歷史，《自由中國》雜誌是永遠無法繞開的思想資源，從其1949年11月20日創刊到1960年9月1日發行最後一期為止，它所展開的是中國自由主義在政治實踐中的一個完整過程，它本是應對大陸「共產主義極權」思潮而生，但這種隔海相望的思想操練難免凌空蹈虛，並無法獲得持久的問題資源，反而常常成為本土威權政府所利用的意識形態。當《自由中國》將視線投回到台灣本土，他們發現所面對的是一個活生生具有整體主義性格的政治權威，正如錢永祥所分析的，只有在此時，自由主義才在台灣扮演其異議意識形態 (dissent ideology) 的角色。這種異議角色，在1949年之前是共產黨等左翼組織所扮演，基本上是共產主義和國民

《自由中國》雜誌是考察台灣自由民主思潮永遠無法繞開的思想資源，它本是應對大陸「共產主義極權」思潮而生，但這種隔海相望的思想操練難免凌空蹈虛。當《自由中國》將視線投回到台灣本土，他們發現所面對的是一個活生生具有整體主義性格的政治權威，只有在此時，自由主義才在台灣扮演其異議意識形態的角色。

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缺乏激進行動因子，往往在政治實踐中顯得無力。這一方面與自由主義學理強調個人主義而輕忽社會運動有相當的關係，一方面也與中國早期揭櫫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的性格大多溫和持平有一定的聯繫。張佛泉在1953年就闡發的「諸自由即諸權利」，卻始終無法在中國語境下伸展激進的含義。

黨獨裁之間的對決，自由主義尚無法發揮其正面作用，但是在1952年之後，當自由主義獨立面對一個威權政府時，它所需要的不僅是思想資源的準備，同時還要面對如何參與政治的實踐問題。

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缺乏政治實踐的經驗，這一方面與自由主義學理強調個人主義而輕忽社會運動有相當的關係，一方面也與中國早期揭櫫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的性格大多溫和持平有一定的聯繫。胡適在《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六期中的〈寬容與自由〉一文中，還在宣揚「寬容」是自由的真諦，這遭到殷海光的批評。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缺乏激進的因子，往往在政治實踐中顯得無力。儘管在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中，洛克式的權利理論可以推導出激進的結論，但是張佛泉在1953年就在漢語思想界中闡發的「諸自由即諸權利」卻始終無法在中國語境下伸展出激進的含義，這是否與中國傳統思想強調「中庸調和」的特徵有關，尚需思想家作更細緻的爬梳。但是毫無疑問，早期《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仍然以傳統士大夫的「諫議」心態面對威權政府，反對黨的議題雖一再出現，但始終無法真正成為《自由中國》同仁的共識，也說明這一時段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缺乏政治實踐的思想準備。

台灣的自由主義在此情境下，是如何從早期的「諫議」轉換成政權更替的民主實踐，尚需進一步考察。但是後期《自由中國》的政治目標發生改變卻是無可置疑的，這固然可能是政府權力不斷壓迫所導致

的自然反彈，更可能是由於台灣的自由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思想的轉捩點有關。對於他們而言，自由主義如何展開政治實踐已經成為迫切的問題，反對黨的主張在此時成為雷震等人的核心思想似乎是水到渠成。雷震在1960年8月16日第二十三卷第四期的〈駁斥黨報官報的謬論和誣衊〉一文中明確提出：「民主政治的建立，在於政權的『有效制衡』與『和平交替』；而政權的『制衡』與『交替』，則有賴於強有力的反對黨之存在。」同早期《自由中國》習慣在現有政府框架下展開憲政與地方選舉等議題的討論不同，雷震等人此時認識到，台灣的自由主義一直以來從憲政以及權利的路徑入手，無法根本解決政治權威轉型的問題，唯有訴諸「民主」這樣的激進價值，方可展開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這一幕由「自由」走向「民主」的劇目其實並不陌生，早在1948年國大會議時，強調立憲主張的張君勱同多年好友張東蓀最終決裂，張君勱試圖在憲政的架構下改造政府權威，最終實現憲政的主張，但是張東蓀卻認為憲政主義不足以立國。1948年7月20日，他在《北大半月刊》第八期上發表〈紀念李二先生——民主與革命的關係〉一文，明確提出民主主義與革命是緊密相關的，民主的結果需要一個激進的政治實踐過程。張東蓀和張君勱的分道揚鑣，無疑說明民主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政治實踐上的態度分歧早就存在，所不同的是，以雷震為代表的《自由中國》終於體會到以憲政主義和權利理論為基礎的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無法應對政治

實踐過程的殘酷與血腥，其中庸和漸進的政治性格只能使自身被逼壓到社會的邊緣，最後只能依靠雷震等人一己之道德勇氣，最終完成個人挑戰國家機器的悲劇。

《自由中國》的這一段歷史，見證了中國自由主義由「書生議政」到民主運動的完整過程，它的受挫固然令人扼腕嘆息，但是它卻明確昭示着台灣民主運動的趨勢。二十世紀80年代台灣的黨外運動無疑是延續了《自由中國》後期的民主訴求，唯一區別只在於他們最終成功，而《自由中國》卻被扼殺在搖籃之中。但是以思想史的意義而論，《自由中國》的經驗最為深切地展示了中國自由主義傳統中的困境所在，權利、憲政等思想資源並無法提出一套建立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可行方案，而更具激進色彩的「民主」價值最終頑強地浮出水面，無疑顯現出在中國近代史中，建立政治秩序所面臨的激進與漸進的兩難處境。

不過值得提出的是，以上所述的思想線索並無法涵括《自由中國》所有作者的問題意識和實踐的方式，如殷海光就試圖以科學來推導出自由的價值，這種思考路徑顯然和張佛泉、雷震等人有所區別。至於今天台灣所面臨的民粹民主的現況，不得不說，民主的激進性假如不能在憲政體制下加以限制和約束，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同樣是岌岌可危。當然，這些反思都可稱為是所謂的「後見之明」，《自由中國》所面對的問題關懷自然和其面對的時代局勢相關，反思或許更多不是為了苛責先人，而是為了勉勵後來者。

對於大陸思想界而言，雖然對胡適、殷海光等人的思想都相當熟悉，但是並沒有把他們放在《自由中國》這樣一個群體中深入地理解。《自由中國》的重要性一直被忽視，一方面固然是兩岸信息的阻隔，另一方面也由於《自由中國》雜誌的研究在對岸學術思想界也並非熱門顯學。要對《自由中國》的思想史意義作出更為確切的判斷，還需要兩岸學術界更為細緻深入的梳理。

要做好以上的工作，資料的整理自然尤為重要。受限於眼界，筆者對《自由中國》雜誌結集的情況所知甚少，只知道台灣曾在70年代出版過一套選集，但未能在大陸看到。所幸的是，由李福鐘、陳儀深、潘光哲等人主編的《自由中國選集》已由台灣稻鄉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書中序言可知，他們原本打算編纂全集，而且台灣遠流出版社也已經於2000年出版了《〈自由中國〉全二十三卷總目錄暨索引》，但是由於無法取得所有作者的授權，因此不得不忍痛放棄全集的編纂工作。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個選集輯結了《自由中國》比較重要的文章，如有名的「祝壽專刊」上的社論〈敬以靜言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等等，這些在當時引起激烈反應的文章無疑展示了那個情境下的重要糾結所在，也正是這些政論名篇，一筆筆地楔入那個時代，留下深刻的歷史印記。

這套文選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文章都是按照議題分卷出版的，這也表示，這套文集並非簡單的編綴，而是摻雜了編選者對《自由中國》的一套認知，在我看來，七卷所分

《自由中國》的歷史見證了中國自由主義由「書生議政」到民主運動的完整過程。二十世紀80年代台灣的黨外運動，無疑是延續了《自由中國》後期的民主訴求，唯一區別是他們最終成功，而《自由中國》卻被扼殺在搖籃之中。至於今天台灣所面臨的民粹民主現況，不得不說，民主的激進性假如不能在憲政體制下加以限制和約束，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同樣岌岌可危。

別涉及到的七個議題(自由民主的基本概念，司法與人權，憲政問題，言論自由，地方自治、選舉與反對黨，黨國體制的批判，國際情勢與中國問題)已經比較完整地呈現出《自由中國》的問題意識，大大方便了研究者。而且每位編選者在每卷的前面都附有自己對此專題的研究專論，或者可以說是導讀，這也顯示出他們的編選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其研究關懷作為底蘊。

如果說還有一些讓我個人不完全滿足的話，那就是在每卷中，將文章按照時間排序比按照主題編排似乎更能顯現出《自由中國》關懷的變遷，能展現出一條清晰思想和社會歷史互動的脈絡。當然，這種技術上的挑剔無法抹殺編者的功績。值得一提的是，在閱讀每卷的導論時，編者對於自由民主強烈的關懷始終讓人難以忘懷，《自由中國》的精神尚有餘續，實為幸事。

晚餐之後是午餐？

● 余世存

中國人在80年代的生活多有出位之思和超越性努力。隨着「發展是硬道理」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密化，精神思想愈來愈成為少數人的事。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少關心想想領域的進展，中國人在精神思想上的努力多已孤絕無援。人們最多聽說近十幾年的文化界很「熱鬧」，卻不了解裏面的熱鬧有何、為何、如何。



丁東等：《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人文對話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自真理標準大討論等思想解放運動以來，精神、思想一類的虛擬空間，在中國人心中一直有着實在的位置，那時候的中國人對真理、藝術、學問、家國的熱愛遠大於發財致富的衝動，中國人在80年代的生活因此多有出位之思和超越性努力。隨着「發展是硬道理」觀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密化，精神思想愈來愈成為少數人的事，成為個人的事。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少關心想想領域的進展，中國人在精神思想上的努力多已孤絕無援。人們最多聽說近十幾年的文化界很「熱鬧」，卻不了解裏面的熱鬧有何、為何、如何。而對近百年現代化史上的文化努力，更是聞所未聞，或無有輪廓。在這些方面，《思想操練——丁東、謝泳、高增